

论冯玉祥五原誓师的原因

黎世红

(重庆教育学院 政治经济系, 重庆 400067)

摘要: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的外部原因是国共两党对他长期的争取和苏联对他的争取和援助,而内在原因则是他本人思想上的进步。

关键词:冯玉祥;五原誓师;原因

中图分类号:K2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1)04-0075-06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接受三民主义思想,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参加北伐战争。五原誓师标志着冯玉祥和国民军正式走上国民革命道路,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是冯玉祥政治立场的一次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国民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五原誓师后,冯玉祥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国民军从绥远南下,进军陕西、河南,并与武汉北伐军会师郑州,从而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冯玉祥之所以会在南方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举行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究其原因,与国共两党对他的争取有关,与苏联对他的争取和援助有关,也与冯玉祥本人思想上的转变有关。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对冯玉祥展开了积极的争取工作。在国共合作关系建立以前,国民党与共产党对冯玉祥的争取工作分别进行。在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冯玉祥的争取工作既有分别,又有联合。由于国共两党合作,在争取冯玉祥的问题上,联合的争取工作占主导地位。国共两党对冯玉祥的争取工作主要由徐谦、李大钊等人负责。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很早就对冯玉祥开展了争取工作。1920年,冯玉祥率军在武汉暂驻时,孙中山的代表徐谦等人就与冯玉祥有过联系。在北京政变之前,孙中山多次派徐谦、孔祥熙等人争取冯玉祥反直。冯玉祥对孙中山的代表表示终究要举行反直行动。北京政变后,孙中山祝贺冯玉祥推倒贿选政府,冯玉祥则立即派人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政。在冯玉祥主持召开的北苑会议上,为了表示迎请孙中山北上的诚意,会议公推国民党人李烈钧、李书城为内阁参谋总长、陆军总长。这说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与孙中山对他的争取工作有关。孙中山到达北京后,送给冯玉祥三民主

为了完成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军阀的任务,

义读本 6000 册,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 1000 册,向他宣传革命理论。孙中山病逝后,徐谦、于右任、李石曾、顾孟余等人继续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开展工作。

在争取冯玉祥的问题上,中共中央与中共北方区委最初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在北京政变前就对冯玉祥开展了争取工作。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驻南苑时,李大钊利用冯玉祥与吴佩孚的矛盾,积极劝冯反直。他曾对冯说道:“孙先生在南方,冯检阅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协力,效法苏俄,刷新政治,中国就有前途。”冯玉祥高兴地表示:“教授一夕谈,胜读十年书。”[1](14 页)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也可能与李大钊的影响有关,“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冯玉祥的这次兵变是受李大钊的影响的”[2]。北京政变后,李大钊又积极帮助冯玉祥向苏联争取军事援助。这说明中共在北方的负责人李大钊对冯玉祥的争取工作开展得较早。但中共中央对冯玉祥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北京政变后,陈独秀认为政变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3]。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宣言把冯玉祥与段祺瑞等不加区别地看待[4](第一册,390 页)。直到 1925 年 10 月,北京中央执委扩大会才改变了“四大”对冯玉祥的认识。会议指出:国民军“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4](第一册,464 页)。1926 年 2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肯定了国民军在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会议指出:“北方国民军固然漫无中心,还决不是革命的人民的武力,可是他们确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并且确有破坏崩裂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作用。”[4](第二册,55 页)

国共两党对国民军的争取和帮助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帮助国民军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北京政变后,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通过李大钊、于右任的帮助,向苏联提出援助请求。1925 年 2 月,冯玉祥邀请徐谦、李大钊到张家口,商谈向苏联争取军事援助的问题。在胡景翼、冯玉祥的请求下,

苏联政府作出了援助中国国民军的决定。苏联政府在研究国民军领导人的援助请求时,“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5](7 页)。这里主要是指李大钊等人的意见。

第二,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李大钊、徐谦积极争取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李大钊为国民军制订了详细的政治工作计划,预定成立 10 个俱乐部,作为开展政治工作的基础。在俱乐部设立政治经济学小组和三民主义小组,在俱乐部外围设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在李大钊、徐谦的劝说下,冯玉祥同意成立 2 个俱乐部。国民军的政治工作主要由李大钊、徐谦领导。“五卅”运动后,李大钊派出宣侠父等人进入国民军中,主办政治俱乐部。李大钊、徐谦开创的政治工作虽然未能在国民军中得到推广,却为五原誓师后在国民军中正式开展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三,支持国民军与直奉军阀及英日帝国主义作斗争。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在政治上受到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斥,在军事上受到吴佩孚、张作霖的压迫,因此,冯玉祥与张作霖、吴佩孚的矛盾十分尖锐。而反帝爱国是冯玉祥一生中十分鲜明的政治主张。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利用冯玉祥与段祺瑞、张作霖的矛盾,积极争取和支持冯玉祥,打击段、张的势力。在“五卅”运动和大沽口事件中,冯玉祥与国民军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立场。冯玉祥在“五卅”运动中的爱国表现,在中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国内很多进步青年为反抗帝国主义而投奔国民军。冯玉祥发出对全世界基督教徒质问电后,西方评论者认为“基督将军”已经“叛离”了基督教。1926 年初,吴佩孚、张作霖实现“联合讨赤”,并制定“先北后南”的策略,即先消灭北方的国民军,再对付南方革命力量。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指出:“目前在北方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4](第二册,61 页)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发动群众支持国民军与直奉军阀的斗争。大沽口事件发生后,徐谦、李大钊在北京组织群众游行,直至发生“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民众“不惜以重大牺牲实际援助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4](第二册,88 页)。

第四,帮助国民军制定战略部署。由于“讨

赤”联军的兵力远远超过国民军的兵力,国共两党领导人与苏联顾问为国民军制定了退守南口的战略部署。1926年3月19日,李大钊在北京主持有苏联顾问参加的国共两党领导人会议。会议接受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的建议,认为国民军必须退出京、津,将主力撤至南口。李大钊指出:“国民党当前的任务就是帮助国民军保存力量,虽说国民军只不过是国民党的友军。”〔6〕(76页)会后,国民党人李石曾赴平地泉向冯玉祥汇报。国民军司令部接受李大钊等人 and 苏联顾问的建议,于4月15日将主力撤至南口,准备抵抗“讨赤”联军的进攻,并等待南方革命军的北伐。

从有关材料来看,国民军退守南口并非冯玉祥的本意,而主要是接受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人和苏联顾问的意见。国民军在南口战役中失败后,冯玉祥在日记和《我的生活》中多次言及部队未按照他的意见退到丰镇以西,以致遭敌围攻。1926年8月23日,冯玉祥在回国途中写道:“故吾未出国时,早有令全军退至丰镇以西之训令,以诱致其自相火并,惜未实行……特我军战败而退,远不如乘胜西行之足以保全兵力耳。”〔7〕(77页)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也曾提到部队未按照他的意见向西远退,以致于在南口战败。这说明国民军退守南口并非冯玉祥的本意,而是李大钊等人 with 苏联顾问的意见。此事表明李大钊等人已经能够影响国民军战略部署的制定。李大钊等人为国民军制定坚守南口的战略部署的目的就是等到南方革命军出师北伐的时候,国民军能够从北方响应。国民军后来虽然未能守住南口,但牵制吴佩孚、张作霖的兵力,并从北方响应北伐战争的目的却得以实现。

二

冯玉祥能够响应北伐战争,也与苏联的支持分不开。苏联对中国国民军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北京政变后,苏联报刊认为,政变是英美帝国主义策划以冯玉祥取代旧工具吴佩孚的结果〔8〕(69页)。后来,国民军领导人通过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人向苏联政府提出援助请求。为了争取国民军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国的民族解

放力量,同时,也是为了苏联在国际上与列强作斗争的需要,苏联政府在1925年3月21日正式作出援助中国国民军的决议。从把冯玉祥看作英美的新工具,到作出援助国民军的决定,这其中显然受到李大钊、徐谦等人的影响。

苏联政府在研究冯玉祥、胡景翼的援助请求时认为,必须将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同中国革命形势联系起来。如果援助国民军,就会推动全国形势的发展,因为国民军能够在北方牵制张作霖的兵力,从而对中国革命产生良好的影响〔5〕(7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说:“国民军在华北之成立及其反对封建军阀之斗争,乃是民族解放运动底重大成绩。它们与广州军队共同成为建立中国民族革命民主军队之基础。”〔4〕(第二册,605页)这说明苏联与共产国际把冯玉祥的国民军当作可以争取的力量,即通过物资援助的作用,通过苏联顾问的工作,促使冯玉祥的国民军转变为中国革命力量。

苏联对中国国民军的援助表现为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火援助两个方面。1925年4月底,3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来到张家口,成立张家口顾问团,也称张家口顾问组。组长普特纳,副组长普里马科夫。张家口顾问组工作到1926年8月国民军南口战役失败为止。1925年6月,43名苏联军事顾问来到河南的国民二军中,成立开封顾问团,也称开封顾问组。苏联顾问在国民军中的工作主要是培训军官,帮助生产武器弹药,检查部队的装备、训练,协助国共两党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司令部的工作,帮助制定作战方案,参加重大战役指挥。在军火援助方面,苏联通过在库伦的军械库向国民军提供武器弹药。据《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所引苏联国防部档案材料记载,从1925年3月到1926年10月,苏联向国民军提供步枪59357支、子弹6970万发、机枪230挺、火炮78门、手榴弹10000枚、马刀4000把、飞机3架〔5〕(10页),其中包括给冯玉祥国民一军和岳维峻国民二军的军火。1926年8月15日,冯玉祥在苏联政府开立的两张收据上签字,分别承认收到苏联军火价值6395642卢布、4501999卢布〔9〕(国民军事项类,43页),总价值10897641卢布,

其中包括步枪31500支、子弹5100万发、机枪227挺、火炮60门。冯玉祥在莫斯科签收的军火物资应当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在1926年8月15日以前已经得到的军事援助。

1926年初,冯玉祥因形势不利而通电下野,中国北方局势发生逆转。为了考察中国形势,研究对冯玉祥和广州政府的援助问题,并考察苏联顾问在华的工作情况,苏联派出由苏共中央委员、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领的使团来华。使团于2月初到达北京后,仔细研究了对冯玉祥的援助问题。冯玉祥在包头接见使团成员。经过考察,使团认为必须加强对冯玉祥的援助,以争取他转向革命。布勃诺夫和加拉罕认为,“革命阵线争取冯玉祥是值得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国民革命运动的思想”[10](330—331页)。他们提出了加强对冯玉祥争取工作的具体意见:第一,扩大军事援助规模,在天津建立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模范师;第二,力争为冯玉祥派1名像鲍罗廷那样的政治顾问;第三,通过国共两党对冯玉祥施加影响,为冯玉祥培养干部,在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布勃诺夫使团对国民军的考察,有助于加强苏联对国民军的援助,因为使团的报告“将得到莫斯科的基本同意”。1926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可能就是以使团的报告为基础决定继续援助国民军的[11](146页)。苏联的援助增强了国民军的军事力量,有助于推动冯玉祥向革命阵营的转变。

三

冯玉祥能够举行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与他本人思想的转变也分不开。冯玉祥思想的转变也是国共两党与苏联对他争取的结果。在国共两党和苏联的争取下,冯玉祥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冯玉祥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国共两党及苏联对他的争取工作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转变的实现主要是他在访苏期间完成的。在五原誓师以前,尽管国共两党对他开展了积极的争取工作,但他仍然不愿加入国民党,也没有正式接受三民主义。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在五原誓师大会上正式宣布接受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冯玉祥在

政治上的转变与他思想上的进步有着紧密的联系。

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从平地泉出发,取道库伦,前往苏联。他在库伦停留1个多月时间,考察蒙古社会,并学习政治理论。5月9日,冯玉祥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冯玉祥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李可夫、加里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伏罗希洛夫等,会见了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蔡和森等人。8月17日,冯玉祥离开莫斯科回国。通过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考察和对革命理论的学习,冯玉祥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冯玉祥认识到政治理论对于政治行动的指导作用。以前,冯玉祥没有认识到政治行动必须有政治理论作指导。他既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没有接受某种理论为指导思想。他认为,他的政治行动就是救国救民,却没有意识到救国救民离不开正确的理论指导。用冯玉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于“革命的主义”没有考察过[12](492页)。这种情况直到访苏期间才有所改变。

冯玉祥在库伦期间就开始注意学习政治理论。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长丹巴多尔基、苏联驻蒙大使尼氏、共产国际在库伦的代表阿姆加都对冯玉祥阐述革命要有理论指导。冯玉祥在莫斯科期间,陪同访问的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与冯玉祥同住莫斯科郊外的查理村,乌斯马诺夫每天给冯玉祥讲1个小时的辩证唯物论,加里宁、季诺维也夫等人都对冯玉祥谈到革命理论问题,蔡和森、刘伯坚等人也反复对冯玉祥阐述中国革命必须有理论作指导的问题。他们指出,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中共要学习十月革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些都使冯玉祥认识到理论指导的重要意义。

其次,冯玉祥认识到参加政党组织的重要性。过去,冯玉祥“受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的影响,认为“国家政治,总还是选贤与能的好”,如果结成党派,就“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端”,因此,他反对政党组织,把现代政党组织看作封建性的朋党组织,把国民党看作“营私结党”的小集团[12](421页)。通过在库伦的考察、学习,冯玉祥对政

党组织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他看到蒙古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致力于建设事业,很有一种奋发进取的精神。冯玉祥赞赏蒙古在苦寒的自然条件下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蒙古党领导人丹巴向他说明这些成就是主要是靠党的领导而取得的。

当时,正在库伦的鲍罗廷、徐谦积极劝冯玉祥加入国民党。鲍罗廷对冯说道:“公拥有中国最强毅之军队。二十年来,志存救国,但不悉公之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公之救国大策,如有优于国民党者,鄙等当离国民党以援公。倘竟无之,请公速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及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之大成,实所深望!”[13](355页)徐谦极力向冯玉祥说明国民党是有主义和组织的政党,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的党。于是,冯玉祥就由徐谦介绍,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到达莫斯科后,冯玉祥看到苏联虽然实行政党政治,但治国有道,国势强盛。对于非党员毫不歧视,对于党员毫不偏袒,党员干部犯罪反而加重处罚。蔡和森派出的中共党员朱务善等人也反复对冯玉祥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都因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而失败的教训,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在国共两党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这些都加深了冯玉祥对政党组织的正确认识。

再次,冯玉祥认识到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过去,冯玉祥对于军队政治工作持保守和怀疑的态度。他虽然批准了李大钊提出的政治工作计划,但他对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政治工作并没有在全军展开。通过在苏联的考察,冯玉

祥懂得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意义。在莫斯科期间,加里宁、托洛茨基都对冯玉祥谈到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托洛茨基告诉他:治军在主义,不在武器;作战以骑兵为要,尤其在宣传。“此种理论皆冯氏前所未闻未知者,不啻为其开了新眼光”[14](245页)。冯玉祥看到苏军很注重政治工作。军队实行政治工作制度,士兵的政治觉悟很高。就政治工作而言,冯玉祥认为“红军的教育原则是史无前例的”[8](213页)。

在与中共人员的交谈中,中共党员刘伯坚、朱务善等人进一步对冯玉祥阐述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刘伯坚对冯玉祥讲到,苏俄红军在艰苦的条件下,依靠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团结群众,战胜强大的敌人。这对于国民军来说,很有借鉴意义。朱务善向冯玉祥说明,国民军“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就是很好的政治工作内容。冯玉祥认识到军队政治工作重要性后,便邀请刘伯坚同行回国,帮助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

总之,冯玉祥通过在苏联的考察和学习,认识到救国救民必须有理论作指导,必须有政党领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12](481页)。“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12](490页)。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新的思想认识,冯玉祥回国后,便宣布接受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并任用共产党员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可见,访苏后的思想变化是冯玉祥响应国民革命的内在条件。

参考文献:

- [1]余华心.冯玉祥与共产党交往片段[A].红旗飘飘:第27集[M].转引自:阎自新.李大钊和冯玉祥[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 [2](日)伊藤武雄.革命的启蒙者与先驱[N].光明日报,1983-04-26.
- [3]向导,第89期.1924-10-29.
-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5](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M].曾宪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6]李善雨,杨树升.李大钊与国民军[J].齐鲁学刊,1985,(2).
- [7]冯玉祥日记:卷七[M].转引自阎自新.李大钊和冯玉祥[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 [8]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獻资料选编:第一辑[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 [9]京师警察厅编译会.苏联阴谋文证汇编[M].1927.

- [10] (苏) 亚·伊·切列潘诺夫.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M].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11] (苏) 贾比才, 等.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M]. 张静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2] 冯玉祥. 我的生活: 下册[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 [13] 李泰棻. 国民军史稿[M]. 台北: 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1971.
- [14] 简又文. 冯玉祥传: 下册[M]. 台北: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

On Causes of Feng Yuxiang's Wuyuan Rally

LI Shi-hong

(Political Economics Department, Chongq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Feng Yuxiang holds Wuyuan Rally to pledge resolution and joins the Nationalist Party, of which the external cause is the National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s long-term work to win him over, as well as the Soviet Union's aid, while the internal cause is his own progressive ideology.

Key words: Feng Yuxiang; Wuyuan Rally; cause

[责任编辑: 凌兴珍]

● 文史札记

苏舜钦《暑中闲咏》诗补校注

傅平襄先生与胡问陶先生合著的《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 1990 年版, 以下简称《校注》), 扎实严谨, 材料丰富, 可谓研究苏氏作品的集大成之作, 但惜仍有疏漏。例如, 其中对于苏氏的《暑中闲咏》诗未作任何校勘, 并注为吴中诗(卷第四, 二八九页), 笔者以为, 尚可补充商榷。

今检《汴京遗迹志》(1959 年中国书店影印明嘉靖二十五年刊本), 见其卷十“延庆观”下转引了陈颀《闲中今古》中的一段材料, 曰:

后于延庆观东偏道士房见一石刻, 乃苏子美所作诗: “瓜果浮沉酒半醺, 满床书史乱纷纷。北轩凉吹开疎竹, 卧看青天行白云。”因录于此, 以见当时士大夫其所著述何可胜数, 如此诗者, 不过一时口占, 尚刻之于石, 则其它大述作而为世所珍重者, 不为后人柱下之石, 能几何哉?

文中所载之诗即苏氏《暑中闲咏》, 然与《校注》所记有所不同, 如“瓜”、“满”、“床”、“史”、“疎”, 《校注》分别作“嘉”、“床”、“头”、“册”、“疎”, 如此, 则前者可作后者之补校。

又《汴京遗迹志》系明李濂所撰, 刊行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则其中提及的陈颀必为同时或之前人, 然惜其人其文均不可考, 仅《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 1924 年版)有同名之人的记载, 曰:

陈颀, (明) 长洲人, 字永之。景泰中(1453 前后)以春秋领乡荐。

或即为一。但不论如何, 陈颀所见此诗, 定早于《校注》所依据的苏诗任一版本。因为苏集到了清初, 已经不易觅得, 所以, 陈颀所见, 极具参考价值。

因苏氏此诗, 据陈颀所说, 乃苏氏当时口占之作, 并刻之于石, 由此可推知此诗当作于汴京延庆观内, 这比仅凭诗意而断定其作于吴中似更可信。(李 璞)